

[文章编号] 1671—8178(2017)04—0041—06

《三国志》对“春秋笔法”的继承与创新

何新楚,何顺畅

(湖北职业技术学院,湖北 孝感 432000)

[摘要] 晋史学家陈寿的《三国志》问世以后,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,一直被视为“前四史”之一。其实,它是我国史学史上继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之后,又一部十分重要的撰述封建社会分裂时期的国别史。作者博采众家之长,自创全新撰述体制,高质量地锻造了汉、晋之间的历史链条。文章从陈寿借鉴《国语》,精心设计形制体例;人为本位,创新纪传构成模式;开创品评,拓展人性多元审美三个方面,论述了《三国志》对“春秋笔法”的继承与创新,以窥探其对我国史学、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。

[关键词] 三国志;春秋笔法;继承;创新

[中图分类号] I206.2

[文献标识码] A

DOI:10.16347/j.cnki.cn42-1742/z.2017.04.010

孔子之后,我国史学界对“春秋笔法”的理论研究与实践,大凡可作这样的表述:司马迁以降,有成就的史学家,一般都师法孔子修《春秋》的笔法。他们通过对史料的精审取舍、叙事的曲折隐晦、用词的缜密谨严、体制体例的匠心安排等手段,以寄寓褒贬,蕴含旨趣,体现其史著的“微言大义”。今天,我们回观《三国志》的构成形态与旨趣释放,深感陈寿对“春秋笔法”的实践与感悟,似乎全在这一表述之中又不全在其中。这是因为《三国志》对“春秋笔法”的继承明显,而创新点更突出。

《三国志》的文本事实告诉我们:陈寿撰述《三国志》,“春秋笔法”的继承与创新,集中体现为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、民族精神血脉的延绵为主线,人为本体,据实而书,鞭笞丑恶,高扬善美,理论是非,内敛正统,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,又一次由合而分、由分而合、由治而乱、由乱而治的内在逻辑。为此后社会分裂时期的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、新旧《五代史》的编撰,提供了弥为珍贵的经验与借鉴;也为后世传记文学的发

展,提供了新的范式。

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看,史家对“春秋笔法”的运用,无非出于被动、主动两种心理动机。前者表现为对其传统内涵直接继承,后者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。因由诸多因素的影响,陈寿之于“春秋笔法”,是被动与主动兼而有之,亦即继承与创新并举。

一、借鉴《国语》精心设计形制体例

自孔子修《春秋》以后,我国史学史上以正统观统摄著述,遂被视为“春秋笔法”的核心。由于三国时期所提供的社会现实、史学素材的特殊性,陈寿《三国志》演绎正统观的意念与方法别具独创性,导致后世接受者歧见纷纭,直至时下的陈寿及《三国志》研究,谁也不能避而不谈其正统观问题。毋庸置疑,陈寿是《春秋》以来第一个为社会分裂时期著史的个体作家。当是时,传统的正统观,第一次面临对峙政权的多元政治诉求,亦即三分天下的魏、蜀、吴三国,都自诩是“传承汉制”的正统。对此,该作怎样的取舍选择与是非判断,便成为陈寿著《三国志》必须破解的难题。

[收稿日期] 2017-09-27

[作者简介] 何新楚(1949-),男,湖北安陆人,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,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。

从《三国志》现存文本的语言形态看,陈寿似乎选择了以曹魏为正统。但是,就《三国志》实际蕴含的是非评判与思想情感倾向而言,“帝魏”并不是陈寿对正统观的真实表述,而是他著述过程中使用的“遮眼法”。也有人说他在《魏书》《蜀书》《吴书》分别成书之后,迫于西晋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政治高压,违心地加上了“帝魏”符号。因为《三国志》文本的客观存在确实提供了持这种看法的可能。有鉴于此,我们与其盲目地用“矛盾”一词去评说陈寿,不如对《三国志》长存的文本事实,更多一些尊重与深入研究,或许更能准确地把握陈寿跳动在《三国志》里的真实思想脉搏。

陈寿为三国著史,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史学素材,与孔子所表现的春秋时代惊人地相似。尤其是在原有大一统王朝日益式微,逐渐沦为影子政权,进而从政治舞台上消失,社会分裂,诸侯林立,政治黑暗,战乱频仍,人民熬煎于水深火热之中,切盼天下统一等方面,几乎是历史重演。孔子所修的《春秋》,在中华文明史上,至少形成了两个千古不易的文化存在:一是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,经过两汉古、今经学大师的潜心研究,全方位地释放出了圣人“立言”的不朽价值;二是《春秋》文本在构成过程中形成的“春秋笔法”,历经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史著撰写实践的感悟、体会、发挥、运用、丰富,已成为史学家人必崇奉的圭臬。这是陈寿撰《三国志》必然继承“春秋笔法”的史学文化背景。

《三国志》现存文本形态说明,陈寿的史学眼光,没有静止地停留在传统的“春秋笔法”上,也不拘泥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所提供的近代纪传体经验,而是在更广阔的史学视域里,吸纳前人的史学艺术营养,对前人的史学辉煌发扬光大。从他曾师事著名史学家谯周研习《春秋》《汉书》的学养看,他已对“春秋笔法”形成了自己的现代认识,对著述的结构构思,不是一时的灵感勃发,而是基于对各种主客观条件的能动考量:

《春秋》是编年体通史。孔子所依据的蓝本是与周王室存有特殊因缘关系的鲁国官方史书。陈寿所要撰述的三国史不具备这些现成借鉴。他必须另辟蹊径,自创条件。

魏、蜀、吴三国的生命周期具有差异性、不确定性。三国时期的时跨,即便算上前后适当延伸的空间,也只在百年之间,且这动乱的百年,没能留下似

《汉书》撰写《志》《表》的史料记载,这就决定《三国志》没有如《春秋》《左传》那样成编年体通史的可能。

尤为重要的是,孔子所置身的春秋时代中、后期,周王室尚残存影子政权,他有条件、有激情、也有责任以鲁国纪年为线索,演绎当时普遍认同的“尊周”正统观。而陈寿心仪的大汉王朝,在他出生的前三年,连影子也风飘云散了,给他留下的是不忍目睹、又不得不直面的复杂现实:激烈对峙着的魏、蜀、吴三国,均自称正统,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,而且在行政区域(州、郡、县)设置、官吏委任、推行法律法令、文化教育等方面,并承汉制。而这种“承汉制”,本质上是“大一统”观的直接表现。加之当时,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这句话,不只是徐庶等特有的心理写照,更是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心态。陈寿不可能超然其外。如何让这种“大一统”观串连起四分五裂、错综复杂的三国史实?遂成为陈寿撰述《三国志》中最重要的形态架构工程。

陈寿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中,完成了对《三国志》形态的独创性构思。

于《三国志》的外部结构层面,他从我国第一部国别史《国语》及后来同类型的《战国策》中,找到了形制体例借鉴。因为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串连历史人物言论、行事的纲绳,正是由孔子的“尊周”观演进而来的为各诸侯国所力行的“统一”观,而这种“统一观”经秦、汉帝国的政治文化建设而定型化,遂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一以贯之的“大一统”观。“统一观”在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里的表现是内敛式的,这恰为陈寿的结构设计提供了直观的实践经验。

对《三国志》的内部构成,他从纪传体、断代史《汉书》中,找到了体制范式。据常璩《华阳国志·后贤志·陈寿传》载:陈寿“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,治《尚书》《三传》,锐精《史》《汉》。”^[1]说明他具备了师法纪传体的充分准备与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在《三国志》的核心层面,他创造性地继承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以“太史公曰”、“赞”的方式,突破了“春秋笔法”暗寓褒贬的传统,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真实描述的基础上,开创了多元类比“评曰”,以强化对人物的历史审美、人性审美。

这些富有创造性的形制设计,自觉地将前代史著的既有优势有机地整合在《三国志》的结构体系中,从而构建了别开生面的外部框架与内部构成模式,即借鉴《国语》,以“国别史”为《三国志》的形态

定位;以《汉书》纪传体断代史为《三国志》的基本体制;对三国各自的正统口号一概存留,且以“三书”的形式,表明自己不作“选边站”,巧妙地内敛了“承汉制”的正统理念。这样,形成了《三国志》国别史、断代史、纪传体三合一的独特形制构架,既尊重了历史事实,又有效地化解了撰述中的许多难题。

建安二十五年(公元220年),曹丕导演了“禅位”闹剧,代汉称尊号。汉献帝在捧出玺绶时,册曰:“咨尔魏王: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,舜亦以命禹,天命不于常,惟归有德。汉道陵迟,世失其序,降及朕躬,大乱兹昏,群凶肆逆,宇内颠覆。赖武王神武,拯兹难于四方,惟清区夏,以保绥我宗庙,岂予一人获义,俾九服实受其赐。今王钦承前绪,光于乃德,恢文武之大业,昭尔考之弘烈。”^[2]虽然“逊位”的话冠冕堂皇,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看似落下了帷幕,但曹丕代汉统自居的种种伎俩,并没有消弭社会对他“篡汉”的揭露与憎恶。唯有其战略中的“承汉制”为时人认可,亦为陈寿所保留。

刚在西蜀立足的刘备,“或传闻汉帝见害”,“乃发表制服,追谥曰孝愍皇帝”。^[3]这是名正言顺的正统观宣示,其政治影响不限于蜀汉疆域。次年(公元221年),刘备“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”,改“建安二十六年”为“章武元年”。显然,刘备称尊号,志在以光武帝刘秀为榜样,发誓要诛灭当代的王莽。这是陈寿最不能忘怀的故国记忆。

东吴孙权于魏黄初二年(公元221年)“使命称藩”,曹丕封他为“吴王”,始建年号“黄武”。但是,“权外托事魏,而诚心不款”。^{[4]832}黄武二年“夏四月,权群臣劝即尊号,权不许。”据《吴书·吴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载“权辞让曰:‘汉家堙替,不能存救,亦何心而竞乎?’”他真诚流露了尊汉情结,也挑明不臣服曹魏的衷曲。黄龙元年(公元229年)夏四月丙申,他“南郊即皇帝位”,旋即迁都建业,与蜀汉联盟。“造为盟曰:‘天降丧乱,皇纲失叙,逆臣乘衅,劫夺国柄,始于董卓,终于曹操,穷凶极恶,以覆四海,至今九州幅裂,普天无统,民神痛怨,靡所戾止。及操子丕,桀逆遗丑,荐作奸回,偷取天位。……今日灭邕,禽其徒党,非汉与吴,将复谁任?’”^{[4]839}这里直接称“蜀汉”为“汉”,不是虚以逶迤。孙权与诸葛亮共同建立了蜀、吴唇齿相依、荣辱与共的合作伙伴关系,携手维护汉为正统的延续。这也是陈寿没有忽视也不能忽视的史实存在。

三国鼎立的格局,客观存在着其战略中“承汉制”的一致性和必然性。陈寿用冷峻的叙事告诉我们:三国对峙,比拼的不只是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,人心向背、民众给力则更为重要。百姓“心在汉”,决定“承汉制”是其必然选择。谁不这样做,谁就会成众矢之的而加速灭亡。故而,三国“承汉制”的战略思想,既构成了历史传统的自然延续,又服务于各自政治、军事、外交斗争的现实需要。在“承汉制”战略的统摄下,三国的政权建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以来行政体制与政策。因此,他们称帝号,本质上是“改朝未换代”都有合理的生存空间。这就构成了三国政治文化特有的矛盾体:历史与现实相斥相存,合理与悖理交织为用。陈寿运用全新体制撰述,不可能对此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,也不必进行是非判断。

事实说明,他能如此详尽其词,据实而书,见事于人,寓意于事,以成其内敛正统观的妙笔,对“春秋笔法”在继承基础上积极创新,全得助于《三国志》独出心裁的形制体例。这是一个充满历史智慧的精妙构思,有效地发挥了陈寿的创作激情与才智。

二、人为本位,创新纪传构成模式

三国鼎立格局,是汉末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过程中,各种矛盾持续碰撞、各色人物竞显风流的产物。发动、主导、演绎三国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大事的,不是一统社会中央政权通行的政策、法令与指令,而是三国统治集团里为实现其政治蓝图而不懈努力的风云人物。这些事件的成败结局,在影响三国各自兴衰历程的同时,更多的是彰显着个个风云人物,以贤愚、忠奸、善恶、荣辱、美丑为标识的命运演绎。因此,确立人为本位的著史理念,创新纪传构成模式,真实地展现三国特有的人文气象与人文精神,成为陈寿撰述《三国志》的出发点和旨归。

首先,这种理念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个性化体验。陈寿的前半生,亲身经历、亲眼目睹了魏、蜀、吴各行其政,自建年号,自诩正统,对峙攻伐,各有胜负,又都未成就统一大业,而终归西晋一统的兴亡全程。三国都有披荆斩棘、励精图治、由弱而强、艰难曲折的创业史,也都有内忧外患、御制失策、走向反面的衰败史。这一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演绎,呈现了悲剧社会的各种悲剧事件、各色悲剧人物,经陈寿本人家国之丧剧痛的浸染与刺激,成为他主观意志涂抹不掉、改变不了的客观存在,促使他对三国兴亡的

认知与理解,别具历史审美眼光与人文情怀。他看到的不只是这些悲剧既有的形态与情节,也不只是它们所体现的历史经验和演变规律,更多的是悲剧中人物美与丑、善与恶、亮丽与腐朽的人性呈现与反响,是这些悲剧中民族文化传统的绵延和民族精神血脉的流淌。

同时,这种史著新模式的选择也是他独特的正统心理使然。陈寿是汉与三国、三国与晋双重巨变之交的史学家,他对相去渐远的大汉帝国的认知与情感,并不停留在师承、传说、典籍、论著等所提供的平面上。他的少年成长,青壮年治学与为官,均置身于蜀汉政权所构建的特殊生存空间,决定他不单是个目睹、听闻三国兴而衰、衰而亡故事的接受者,而同时又是蜀汉悲剧舞台上一个土生土长的士子精英角色。尽管他的政治地位小到微不足道,但是,他毕竟是个学养深厚、思想深邃、积极有为的学者型史学家。蜀汉无时、无处不存在悲情生活环境,尤其是曾经主导这一生活环境的悲壮人物——诸葛亮的高大形象与人格魅力,立体地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、情感倾向、史学意识。因此,他把对大汉太平盛世的深切向往,自然地转化为对蜀汉政权寄予强烈期望;当蜀汉政权一系列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失误而无所作为,“北进中原、恢复汉室”的政治蓝图成为泡影时,他的强烈期望,定然激变为巨大失望;眼见蜀汉政权在内忧外患夹击下,戏剧性地急遽覆亡,其巨大失望,必然滋生出无可奈何的绝望。然而,陈寿终归不是一般西来仕蜀的外地士子,巴山蜀水滋养了他特有的精神文化之根,那种伴随蜀汉政权历程而生成的深切向往——强烈期望——巨大失望——无奈绝望的心理演绎,在经过蜀亡后一段时间的冷静、反思、调整、沉淀后,自然地内化为喜其之兴、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,理性地将曾经最为看重的蜀汉传承正统的思想,深隐在灵魂深处。这既是他对三国均自诩正统持保留态度,肯定它们“承汉制”战略的理论实践基础,又是他不生搬硬套“春秋笔法”的思想依据,更是他综合传统史著表述历史人物的经验,借鉴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纪传体成例,择取三国时期主要风云人物作为《三国志》撰述主体的史学依据,进而立志让《三国志》成为纯粹的人物传记史著。

我国史学史上,素有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之辩,见仁见智。综观《三国志》人物传记的构成体系,陈寿更注重人物与历史、英雄与时势的辩证关

系,更尊重人物在现实生活、历史空间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。因此,他首先关注的是人物的社会关系和人际联系,而非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形而上的观念先行,按人物的身份地位、社会分工,用“本纪”“世家”“列传”(“列传”下又细分种种)对人物标名别类。就笔者的研究统计看,《三国志》里专门标出姓名的各类人物有468人,其中《魏书》250人,《蜀书》86人,《吴书》132人。全部人物有序地分布在三《书》的坐标上。于纵向,人物沿着魏、蜀、吴兴亡演变的时空,伴随特定事件而依次登场;于横向,分为帝室、臣僚两大类。在帝室类,对君主、宗室、王子、后妃各色人物,以类相次,纪年系事,演绎生平;在臣僚类,因人制宜,或以类相次,或专门立传。这种人物谱系出自于陈寿“以人见事,依事见史”的精细构思,既明晰了人物在所属国度的社会关系和人生轨迹,又便于对人物的现实作为、社会影响及历史地位展开描述与评价。

在传统史著里,尽管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表述人物的侧重点明显不同,但有其鲜明的共同特征,即通过人物浮沉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。它们是我国史著纪传体的滥觞。前者记言为主,叙事为辅;后者叙事与记言平分秋色,相辅相成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则是纪传体成熟的标志。它们都注重人物命运的整体描述,即通过人物生平言、行、事的真实再现,揭示人物的功过是非、性格特征和精神品质;在重要人物传记的篇末,作者往往作“画龙点睛”的褒贬评论。《史记》是“太史公曰”,《汉书》则名“赞”。从此以后,我国史书中的历史人物结束了细碎化、扁平化形态,然审美的丰富性尚显不足。

较之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,《三国志》的撰写条件要差得多。陈寿一无家学渊源,诸如司马迁、班固家族父辈史学家司马谈、班彪,为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撰述作前期准备;二无皇家图书馆提供丰富的资料查阅;三是可供参考的当代史料十分有限,仅王沈《魏书》、韦昭《吴书》、鱼豢《魏略》、王崇《蜀书》等私家史著。但是,作为有心人的陈寿,直接采集、整理了蜀汉史料。在《三国志》动笔之前,他撰写了《益部耆旧传》,编辑整理了《诸葛亮集》,这些工作都带有研究性质,且尤为注重在特定历史平台上通览三国人物与事件,借助梳理人物清晰的社会关系,理顺事件的发展脉络,高度艺术化相关典型细节,从而保证了《三国志》的编纂,扬长避短,凝铸特色,自成其人物

纪传谱系。

从内部构成上看,《三国志》的人物历史比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更精密,前后贯串,事不重复;表现人物的方法更丰富,突破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言、行、事并举的传统,而实施言、行、事、文四位一体,构成了人物美学价值的多维度表现,且更具立体化。后世学人对文学史上“三曹”成就的认识,首先得助于《三国志》对其“文章”的标举。诸葛亮是一代贤相,陈寿将《诸葛亮集》编辑面世,实证了诸葛亮同时也是一个多产作家。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对文学的诸葛亮最早做出了准确定位。陈寿把“文章”视为表现人物丰富性的重要方面,并为此付出了不遗余力的辛勤劳动。

《三国志》对人物谱系构成的创新,极大地拓展了人物纪传的容量。用史著表现历史的真实性、丰富性衡量,《三国志》及时记载了当代文化发展的实绩,揭示了三国时期,不仅是个讲“武”的时代,也是个讲“文”的时代。因此,《三国志》堪为顺应时代潮流、服务时代发展的史学宝典。

三、开创品评 拓展人性多元审美

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,对人物一“品”二“评”的创造性设置与灵活运用,既是对前代纪传体传统方法的继承与发展,更是对“春秋笔法”的极大突破。他在运用“春秋笔法”的“是非”“寄寓”“蕴含”等手法时,直接与其笔下人物建立了独特的对话关系。他通过或议论、或品说、或礼赞、或批评,甚至是愤怒的批判等方式,对他笔下的人物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秉持公心,一分为二地进行品评。评,即理性审美;品,即研判定位。诉诸其“评曰”,一方面,从正向引导了当时品评人物的人文风气,助推其转化为历史正能量。另一方面,聚焦历史审美眼光,准确透视现实社会文明与野蛮激烈搏斗中的人性美与丑、善与恶、正与邪、贤与愚等,多元张扬演变的外在可能性与内在必然性。其“评曰”的目的,重在直接将人物或铭之于历史丰碑,或钉之于历史耻辱柱,从而揭示人物内质形成的“外在可能性”“内在必然性”诸多因素的水到渠成。这就大大地突破了“春秋笔法”传统的“劝善惩恶”的伦理教化范畴,人物成了历史的主人而非说教的工具。因而,《三国志》的“评曰”形式活泼,品与评合璧,且妙语连珠,实现了切实的多元化人性审美。

《三国志》人物传记的代表作首推《诸葛亮传》。

该传的前半部,陈寿翰墨挥洒,落笔于人物的不凡处,既详细描述了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独一无二的辉煌建树,更再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君臣之间“休戚相关、荣辱与共”的亲密关系。该传后半部,写诸葛亮精诚辅佐后主刘禅。先是简笔勾勒他“率众南征”,“国以富饶,乃治戎讲武,以俟大举”;后是浓墨重彩地写他六出祁山,直至病卒于五丈原军中。一篇《出师表》把开国老臣的至忠至诚,定位在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八个大字上,感动当时,影响千古。在陈寿看来,诸葛亮虽然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^[5],是三国鼎立中的悲剧人物,但他用生命兑现了自己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的诺言,政治品格与人格无与伦比;他生的慷慨,死的悲壮,虽死犹荣,是三国历史上最具有亮丽人品的风云人物。

对诸葛亮的品评,陈寿可谓用心良苦,极尽生花之笔。他一反惯常做法,采用了多角度、多视域的群言体评价,集中体现了《三国志》人物品评的创新性。

首先是蜀汉政权最高层的政治评说。陈寿记载了后主刘禅祭奠诸葛亮的诏策:

惟君体资文武,明睿笃诚,受遗托孤,匡辅朕躬,继继兴微,志存靖乱;爰整六师,无岁不征,神武赫然,威镇八荒,将建殊功于季汉,参伊、周之巨勋。如何不吊,事临垂克,遘疾陨丧!朕用伤悼,肝心若裂。夫崇德序功,纪行命谥,所以光昭将来,刊载不朽。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,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,溢君忠武侯。魂而有灵,嘉兹宠荣。呜呼哀哉!呜呼哀哉!

这篇诏策,不是普通的官样文章,而是对诸葛亮最切合实际、最入情入理的政治评价。它既是蜀汉君臣对诸葛亮的“盖棺定论”,也是刘禅发自内心的哀悼,更是陈寿发自内心难以抑制的伤恸。

其次是诸葛亮劲敌的才智评价。陈寿特意写了诸葛亮病卒前后的故事:“与司马宣王(司马懿)对于渭南,亮每患粮不继,使己志不申,是以分兵屯田,为久驻之基。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,而百姓安堵,军无私焉。相持百余日。其年八月,亮疾病,卒于军,时年五十四。及军退,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,曰‘天下奇才也。’”司马懿是诸葛亮的劲敌,曾自诩与诸葛亮匹敌。但是,当他实地勘察了诸葛亮留下的军民营地设施、攻防工事的构建布局之后,油然而赞对手是“天下奇才”。司马懿的赞语代表了三国社会精英的一致看法。

其三是西晋新朝君臣的综合评价。泰始十年二月一日,陈寿作为西晋朝臣,在向晋武帝上呈《诸葛亮集》的表文中,全面地评述了他所熟悉、理解的诸葛亮。由于《诸葛亮集》是蜀亡后,由朝中重臣荀勖、和峤上奏晋武帝,降旨陈寿编订的,所以,陈寿的这篇表文,既是他本人的《诸葛亮评》,又代表着西晋武帝君臣对诸葛亮的总评。这在《三国志》的风云人物中,可谓独一无二。

他在表文中坦言:作为蜀汉事业的主导者,诸葛亮“器能政理”的表现,其“奇谋”“将略”的短板,是相对于他“治戎”“理民”的优势而论,不是说他没有“奇谋”“将略”。从表象看,诸葛亮是仅次于管仲、萧何之类的俊杰人物。然而,把他放在历史空间,比之于人民称颂怀念不已的召公、子产,毫无夸张。针对批评诸葛亮文章“文彩不艳”“过于丁宁周至”的杂音,陈寿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,充分肯定了《诸葛亮集》是“声教遗言”,其“经事综物,公诚之心,形于文墨”,既是研究诸葛亮“意理”的第一手资料,又“有补于当世”。陈寿敢于在朝堂上高声将西晋昔日政敌的诸葛亮定位于“一代贤相”,展现的既是历史智慧,更见其政治良知。

时下学术界论者,往往只关注《诸葛亮传》文末的“评曰”,盛赞那段文字是文情并茂、宏论激扬的骈体美文。事实上,在《三国志》成书之前的好多年,这

篇与《诸葛亮集》同时面世的表文,朗朗有声于西晋朝堂,司马炎君臣是它的第一读者(听众)。因其立论持据,开诚布公;知人论世,肯綮精准;由行及文,全面真实,在西晋初年的特殊政治背景下,即获得了朝野广泛的认同。这固然与表文所释放的多元审美价值有关,也为陈寿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的史学慧眼所折服。

诚然,《三国志》品评人物的佳构,绝不限于《诸葛亮传》,诸如对曹操、曹丕、刘备、孙权、董卓等人的“评曰”,素来为学人称赞不已。这些也是我们研究陈寿与《三国志》尤要精读的内容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(晋)常璩.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[M]. 任乃强,校注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:632.
- [2] (晋)陈寿. 三国志·魏书[M]. 裴松之,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5:45.
- [3] (晋)陈寿. 三国志·蜀书[M]. 裴松之,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5:660.
- [4] (晋)陈寿. 三国志·吴书[M]. 裴松之,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5.
- [5] 唐诗鉴赏辞典[M]. 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3:507.

(责任编辑:吕全国)

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“Spring and Autumn Writing Style” in *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

HE Xin - chu , HE Shun - chang

(Hubei Polytechnic Institute , Xiaogan , Hubei 432000 , China)

Abstract: Ever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*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 by Chen Shou , a historian of the Jin Dynasty , it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has constantly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ur best B. C. historical records. In fact , it is another important history book concerning feudal society division period which followed *Guo Yu* and *Warring States*. Chen Shou absorbed the best of other master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created a brand new writing system , thus forging a high - quality historical chain between Han and Jin dynasties. This article , starting from Chen Shou ' s borrowing from *Guo Yu* , analyz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"Spring and Autumn writing style" in *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 and explore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ture.

Key words: *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 ; “Spring and Autumn writing style”; Inheritance; Innovation